



大夏教育文存

孟宪承卷

主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屈 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夏教育文存

孟宪承卷

主 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屈 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夏教育文存·孟宪承卷/杜成宪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675-5919-6

I. ①大… II. ①杜… III. ①教育史—世界
IV. ①G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1904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大夏教育文存 孟宪承卷

主 编 杜成宪
本卷主编 屈 博
策 划 王 焰
责任编辑 金 勇
责任校对 时东明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28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919-6/G·9964
定 价 90.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大夏教育文存》编委会、顾问名单

编委会

顾问 孙培青 陈桂生

主任 袁振国

委员 叶 澜 钟启泉 陈玉琨 丁 钢

任友群 汪海萍 范国睿 阎光才



孟宪承先生(1894 年—1967 年)



孟憲承教育通史稿

下冊

孟憲承教育通史稿

上冊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見稿

教育社會學講義

東南大學教授孟憲承先生在江蘇全省師範講習所聯合會講演

1951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时,也成立了教育系,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之源。当时教育系的教师来自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等高校教育系科,汇聚了一批享誉全国的著名学者,堪为当时中国教育理论界代表。如:国民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曾实施部聘教授制度,先后评聘两批,各二三十人,集中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各个学科的顶尖学者。两批部聘教授里均只有一位教育学教授,分别是孟宪承、常道直,后来都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孟宪承还为华东师范大学建校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出于“抗战建国”、保证中学师资培养的考虑,建立了六所师范学院,其中五所附设于大学,一所独立设置,独立设置的即为建于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院长为廖世承,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师范学院(后为上海师范大学)院长;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奠定中国社会事业研究的基础的言心哲,曾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后转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从事翻译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教育系第一任系主任曹孚,后为支持中央政府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奉调入京;主持撰写新中国第一本《教育学》、后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就是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教育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60多年的发展基础。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批著名学者当年藉以成名并影响中国现、当代教育学科发展的代表性成果大多未能流传于世,他们中的很多人及其著作甚至湮没不闻,以至今天的人们对中国教育学科的由来与发展中的诸多重要环节所知不详,尤其是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对于中国现、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性知之甚少,而这些成果中的相当部分实际上又可以看成是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国化探索的代表作。因此,重新研究、整理、出版这些学术成果,对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的学术传承、对于中国的教育学术传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建校之初,在教育系教师名册上的教授共有27位,包括教育

学和心理学两个学科。当时身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的曹孚被任命为教育系系主任,但由于工作原因晚一年到职,实际上教育系就有教授 28 位。除个人信息未详的二位外,建系教授简况见下表。

出生年代	姓名(生卒年)	建校时年岁	学历、学位
1890—1899	赵迺传(1890—1958)	61	大学肄业
	廖世承(1892—1970)	59	博士
	张耀翔(1893—1964)	58	硕士
	高君珊(1893—1964)	58	硕士
	欧元怀(1893—1978)	58	硕士
	孟宪承(1894—1967)	57	硕士
	谢循初(1895—1984)	56	学士
	黄觉民(1897—1956)	54	硕士
	萧孝嵘(1897—1963)	54	博士
	黄敬思(1897—1982)	54	博士
	常道直(1897—1992)	54	硕士
	沈百英(1897—1992)	54	五年制中师
	言心哲(1898—1984)	53	硕士
	陈科美(1898—1998)	53	硕士
	方同源(1899—1999)	52	博士
1900—1909	赵廷为(1900—2001)	51	大学预科
	左任侠(1901—1997)	50	博士
	谭书麟(1903—?)	48	博士
	萧承慎(1905—1970)	46	硕士
	胡寄南(1905—1989)	46	博士
	赵祥麟(1906—2001)	45	硕士
	沈灌群(1908—1989)	43	硕士
	朱有璫(1909—1994)	42	学士
1910—1919	曹孚(1911—1968)	40	博士
	刘佛年(1914—2001)	37	学士
	张文郁(1915—1990)	36	学士

(本表参考了陈桂生《华东师范大学初期教育学习纪事(1951—1965)》一文)

可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初建、教育学科初创时的教授们,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15人,20世纪00年代的8人,10年代的3人;60岁以上1人,50—59岁16人,40—49岁7人,40岁以下2人,平均年龄50.73岁,应属春秋旺盛之年。他们绝大部分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有不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其中博士8人,硕士11人,学士4人,大学肄业1人,高中2人。他们大体上属于两代学者,即出生在19世纪90年代、成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代(五六十岁),出生在20世纪、于二三十年代完成学业的一代(三四十岁)。对于前一代学者而言,他们大多早已享有声誉且尚未老去;对于后一代学者而言,他们也已崭露头角且年富力强。相比较而言,前一代学者的力量又更为强大。任何一个高等院校教育系,如能拥有这样一支学术队伍都会令人感到自豪!

三

令后人感到敬佩的还在于这些前辈教授们所取得的业绩。试举其代表论之,以观全豹。

1923年,将及而立之年的孟宪承撰文与人讨论教育哲学的取向与方法问题,提出:教育哲学研究是拿现成的哲学体系加于教育,而将教育的事实纳入哲学范畴?还是依据哲学的观点去分析教育过程,批评现实教育进而指出其应有价值?他认为后者才是可取的。理由是:教育哲学是一种应用哲学,应用对象是教育;教育哲学研究导源于实际教育需要,是对现实教育的反思与批评,而其结论也需要经过社会生活的检验。这样就倡导了以实际教育问题为出发点的教育哲学,为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论的转型,即从以学科为出发点转向以问题为出发点,转向更为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儿童,从哲学层面作出了说明。之后,不刻意追求体系化知识,而以问题研究为主、从儿童发展出发思考教育问题成为一时潮流。1933年,孟宪承出版《教育概论》,就破除了从解释教育和教育概念出发的教育学理论体系,而代之以从“儿童的发展”和“社会的适应”为起点的教育学叙述体系。在中国,以儿童发展为教育学理论的起点,其首倡者很可能就是孟宪承。1934年,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其中的《教育概论》纲目与孟宪承著《教育概论》目录几乎相同。而孟著自1933年出版至1946年的13年里共印行50版,是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教育学教科书之一。可以看出孟宪承教育学思想对中国教育学理论转型、教育学学科建设、课程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的深刻影响。

1921年,创始于美国、流行于欧美国家的一种新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道尔顿制传入中国,因其注重个别需要、自主学习、调和教学矛盾、协调个体与群体等特点,而受到中国教育理论界和中小学界的欢迎,一时间,诸多中小学校纷纷试行道尔顿制,声势浩大。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是其中的典范。当时主持东南大学附中实验的正是廖世承。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严格按照教育科学实验研究方法与程序要求进行,从实验的提出、实验的设计、实验的实施、实验结果分析各个环节都做得十分规范,保证了实验的信度和效度,在当时独树一帜。尤其是实验设计者是将实验设计为一个与传统的班级授课制进行比较的对比实验,以期验证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的长短优劣。在实验基础上,廖世承撰写了《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报告依据实验年级各科实验统计数据、实验班与比较班及学生、教师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了实施道尔顿制的优点与缺点,得出了十分明确的结论:道尔顿制的特色“在自由与合作”,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很难实行;“班级教学虽然有缺点,但也有它的特色”。廖世承和东南大学附中的实验及报告,不仅澄清了人们对道尔顿制传统教学制度的认识,还倡导了以科学研究解决教育问题的风气,树立了科学运用教育研究方法的楷模,尤其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了如何对待和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经验,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此外,廖世承参与创办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首开心理测验,所著《教育心理学》和《中学教育》,在中国都具有开创性。

1952年曹孚离开复旦大学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是教育系第一任系主任。1951年,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撰成的《杜威批判引论》出版。书中,曹孚将杜威教育思想归纳为“生长论”、“进步论”、“无定论”、“智慧论”、“知识论”和“经验论”,逐一进行分析批判。这一分析框架并非人云亦云之说,而是显示出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独到把握,超越了众多杜威教育思想研究者。他当时就指出杜威教育思想的主要缺陷,即片面强调活动中心与学生中心,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对杜威教育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孟宪承曾称道:“曹孚是真正懂得杜威的!”后来,刘佛年在为《曹孚教育论稿》一书所做的序中也评价说:“这是我国学者对杜威思想的第一次最系统、最详尽的批判。”曹孚长于理论,每每有独到之论。50年代的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界,先是亦步亦趋地照搬苏联教育学,又对包括教育学在内的社会学科大加挞伐,少有人真正思考教育学的中国化和构建中国的教育学问题。曹孚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包括哲学、国家的教育方针

政策、教育工作经验、中国教育遗产和心理学五方面;针对当时否定教育继承性的观点,他提出继承性适用于教育,因为教育既是上层建筑,也是永恒范畴;对教育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批评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为标准,从哲学、政治立场出发的评价原则,主张将哲学思想、政治立场和教育主张区别而论,主要依据教育思想来评价教育人物;他认为,即使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一棍子打死”,也有可以吸取和改造的。在当时环境下,曹孚之言可谓震聋发聩。

1979年,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新时期”全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教育学教材。之前,从1962年至1964年曾四度内部印刷使用,四度修改。“文革”中还被作为“大毒草”受到严厉批判。1961年初,刘佛年正式接受中宣部编写文科教材教育学的任务。当年即撰写出讲授提纲,翌年完成讨论稿。虽然这本教育学教材在结构上留下明显的凯洛夫《教育学》痕迹,但也处处体现出作者对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思考。教材编写体现了对六方面关系的思考和兼顾,即政策与理论、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历史与理论、正面论述与批判、共性与特性。事实上这也可以作为教育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在教材编写之初,第二部分原拟按德育、智育、体育分章,但牵涉到与学校教学工作的关系,出现重复。经斟酌,决定按学校工作逻辑列章,即分为教学、思想教育、生产劳动、体育卫生等章,由此形成了从探索教育的一般规律到研究学校具体工作的理论逻辑,不失为独特的理论建构。1979年教材出版至1981年的两年间,印数近50万册,就在教材使用势头正好之时,是编者主动商请出版社停止继续印行。但这本教育学教材的历史地位却并未因其辍印而受到影响,因为它起到了重建“新时期”中国的教育学理论和教材体系的启蒙教材作用。

不只是以上几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创系教授在各自所从事的研究领域都有开风气之先的贡献。如,常道直对比较教育学科的探索与开拓,萧承慎对教学法和教师历史及理论的独到研究,赵廷为、沈百英对小学各科教学法的深入探讨,沈灌群对中国教育史叙述体系的重新建构,赵祥麟对当代西方教育思想的开创性研究,等等,对各自所在的学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被载入学科发展的史册。还有像欧元怀,苦心经营大夏大学二十多年,造就出一所颇有社会影响的著名私立高等学府,为后来华东师范大学办学创造了重要的空间条件。所有前辈学者们的学术与事业,都值得我们铭记不忘。

四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此次编纂《大夏教育文存》视为一次重新整理和承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契机。

我们的宗旨是:保存学粹,延续学脉,光大学术。即,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精华加以保存,使这些学术成果中所体现的学术传统得以延续,并为更多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学者能有机会观览、了解和研究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和人生,激发起继承和发扬传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实现我们的宗旨。

就我们的愿望而言,我们很希望能够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科一代代前辈学者的代表作逐步予以整理、刊布,然而工程浩大,可行的方案是分批进行。分批的原则是:依据前辈学者学术成果的代表性、当时代的影响和对后世影响的实际情况。据此,先确定了第一辑入选的11位学者,他们是:孟宪承、廖世承、刘佛年、曹孚、萧承慎、欧元怀、常道直、沈灌群、赵祥麟、赵廷为、沈百英。

《大夏教育文存》实际上是一部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后曾经在教育学科任教过和任职过的著名学者的代表作选集。所选入的著作以能够代表作者的学术造诣、能够代表著作撰写和出版(发表)时代的学术水平、能够为当下的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发展提供借鉴为原则。也有一些作品,我们希望能为中国的教育学术事业的历程留下前进的脚步。

《大夏教育文存》入选者一人一卷。所收录的,可以是作者的一部书,也可以是若干部书合为一卷,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代表性论文的选集,还包括由作者担任主编的著述,但必须是学术论著。一般不选译著。每一卷的选文,先由此卷整理者提出方案,再经与文存总主编共同研究商定选文篇目。

每一卷所选入著述,在不改变原著面貌前提下,按照现代出版要求进行整理。整理的内容包括:字词和标点符号的校订,讹误的订正,专用名称(人名、地名、专门术语等)的校订,所引用文献资料的核实及注明出处,等等。

每一卷由整理者撰写出编校前言,内容包括:作者生平、学术贡献、对所选代表作的说明、对所作整理的说明。每一卷后附录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五

编纂《大夏教育文存》的设想是由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范国睿教授提出的。他认为,作为中国教育学科的一家代表性学府,理应将自

己的历史和传统整理清楚,告诉后来者,并使之世代传递下去。实现这一愿望的重要载体就是我们的前辈们的代表性著述,我们有责任将前辈的著述整理和保护下来。他报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将此项目立项为“华东师范大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获得资助。还商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支持和资助,立项为出版社重点出版项目。可以说,范国睿教授是《大夏教育文存》的催生人。

承蒙范国睿教授和时任教育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汪海萍教授的信任,将《大夏教育文存》(第一辑)的编纂交由本人来承担,能与中国现、当代教育史上的这些响亮名字相伴随,自是莫大荣耀之事。要感谢这份信任!

为使整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孙培青、陈桂生两位先生能够担任文存的顾问,得到他们的支持。两位先生与入选文存的多位前辈学者曾是师生,对他们的为人、为学、为师多有了解,确实给了我们很多十分有价值的指点,如第一辑入选名单的确定就是得到了他们的首肯。对两位先生我们要表示诚挚的感谢!

文存选编的团队是由教育学系的部分教师和博士、硕士生所组成。各卷选编、整理工作的承担者分别是:孟宪承卷,屈博;廖世承卷,张晓阳;刘佛年卷,孙丽丽;曹孚卷,穆树航;萧承慎卷,王耀祖;欧元怀卷,蒋纯焦、常国玲;常道直卷,杨来恩;沈灌群卷,宋爽、刘秀春;赵祥麟卷,李娟;赵廷为卷,王伦信、汪海清、龚文浩;沈百英卷,郭红。感谢他们在选编和整理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劳和努力!研究生董洪担任项目秘书工作数年,一应大小事务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十分感谢!

尤其是要感谢入选文存的前辈学者的家属们!当我们需要了解前辈们的生平经历和事业成就,希望往访家属后人,我们从未受到推阻,得到的往往是意料之外的热心帮助。家属们不仅热情接待我们的访谈,还提供珍贵的手稿、书籍、照片,对我们完成整理工作至关重要。谢谢各位令人尊敬的家属!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文存出版的大力支持!也感谢资深责任编辑金勇老师的耐心而富有智慧的工作,保证了文存的质量。

感谢所有为我们的工作提供过帮助的人们!

杜成宪
2017年初夏

孟宪承(1894—1967),字伯如,一作百如,又字伯洪。江苏武进(今常州武进区)人。著名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1900年入私塾,1908年毕业于常州府小学堂,考入南洋公学中院;毕业后考入清华学校,后改入圣约翰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任清华学校英语教员。1918年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主修教育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深造。1921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光华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先后任第四中山大学秘书长、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文学院院长等。1933年中国教育学会成立,被选为理事。1942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第一批部聘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等。1951年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建校,1952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在华东师大首开中国教育史专业研究生班,亲自任教并为导师。同年,任上海市教育学会首任会长。从1954年起,连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62年起,连任第三、四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因“文革”开始后连遭迫害,于1967年7月19日夜病逝。1978年,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为其恢复名誉,次年,骨灰安放仪式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2006年入选“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名单。

孟宪承一生共出版著、编、译作品二十多种,发表各种论文及通信约170篇,涉及文、史、哲、教等学科领域。孟宪承长期从事教育科学的教学研究和教育管理工作,对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师范教育、语文教学法、教育史、比较教育等均有钻研。比如,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孟宪承在1933年出版的《教育概论》一书当中,明确提出了要以儿童发展为教育理论起点的基本立场,对当时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与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又如,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孟宪承立足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并吸收借鉴欧美大学精神传统,提出了“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的“大学三理想”,为中国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再如,在教育史研究方面,孟宪承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教育史,并系统阐述中国教育史学科理

论,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关于孟宪承的生平与学术贡献,瞿葆奎主编的《孟宪承文集》第一卷中,有该书副主编杜成宪撰写的长篇前言,作了详细阐述。该文集第十二卷中又附有张梦倩所作《孟宪承生平与学术年表》,逐年胪列孟宪承学术贡献甚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本文不再赘述。

二

本卷所收录的《孟宪承教育通史稿》与《教育社会学讲义》两本书,为孟宪承在教育史以及教育社会学研究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著作。

(一) 关于《孟宪承教育通史稿》

《孟宪承教育通史稿》一书,为孟宪承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讲稿,分为上下二卷。上卷为世界教育史,从希腊教育起,到近代欧洲教育哲学止;下卷为中国教育史,从周代教育起,到近代中国教育止。其纂辑的特点,正如作者在上卷前言中所讲,“于近代为详,而于古代为略;于思想学说为详,而于制度沿革为略”。其编纂思想,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证主义史学、实用主义教育等思潮的影响,追求“科学”、强调客观、注重史料,以“求因”(明其背景、探其原因、释其意义、量其价值)和“明变”(递变之迹、废兴之原、穷源竟委,以为今日教育理论与实施之考镜)为教育史研究之任务;以“广识”、“尚友”为教育史研究之文化价值;以丰富的中外史料作为教育史研究的佐证,可以说《孟宪承教育通史稿》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学科价值。其特点有如下方面:

其一,在内容编排上,以人物为主,辅之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比如世界教育史部分,专门论述人物教育思想的有七章,中国教育史部分则有十章,分别从人物生平贡献、教育基本观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同时该书还注重选取与教育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件。比如在“世界教育史”中,除了论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赫尔巴特、杜威等主要教育家思想、学说外,还着重论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兴起、平民政治、工业革命、国家主义等与近代社会发展、教育改革紧密联系的历史事件。同时对于在教育改革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如英、法、德、美、日等,以及具有特殊时代意义的苏俄、意大利等,从教育制度的设计与实施、重要人物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在“中国教育史”中,着重论述教育家的学说与事迹,例如孔子、孟子、荀子、郑玄、王安石、朱熹、王守仁等;其次论述教育的制度与沿

革,作者认为“凡思想制度,皆应时代之要求而产生,不察其过去及当时社会之状况,则无以见其来源。思想与制度之结果,其影响必及于社会,不察其后此之社会状况,则无以得其评价”,所以,“中国教育史”部分又结合了当时哲学史、思想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更加细致地说明了中国历代教育制度与思想的发展变革。再次,对于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作用的佛教教育也兼有论述。

该书还选取“对于现代教育事实和问题的了解上最有需要”的材料作为论述内容,比如“世界教育史”部分最后几章,选取近代教育科学化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儿童研究、教育心理研究、智力测验、教育调查等方面,说明近世科学的发展,在教育领域中产生重要影响,现实教育应以科学为基础,形成科学合理的教育理论;而“中国教育史”部分最后附有《全国教育会议宣言》以及许崇清、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关于全国教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的文章,期望中国的教育研究者能及时掌握教育科学研究之理念,适应世界潮流,应对亟待解决现实中国教育之难题。

其二,在撰写体例上,史料翔实,长于考证。在世界教育史部分,作者对西方学者的论著征引颇丰,卢梭、康德、黑格尔、赫尔巴特、斯宾塞、杜威等人的思想材料都有引用,涉及有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同时,结合国人自编著作进行论证,比如,引用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关于墨子的论述,来说明墨家教义与基督教义之间的异同。再如引用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中对于文艺复兴的评价,来说明欧洲文化从希腊思潮、基督思潮到文艺复兴的转变,对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是对教育产生的影响。中西资料的结合,也体现出作者融通中西的意图。在中国教育史部分,人物传记选取《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汉书·郑玄传》、《宋史·朱熹传》、《明史·王守仁传》等正史中的记录,正史以外,则引用《洙泗考信录》、《孟子事实录》、《朱子年谱》、《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历代学制选取《尚书》、《周礼》、《礼记》、《通典》、《文献通考》、《玉海》、《古今图书集成》等中的材料;社会背景则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伦理学史》等书中的内容加以论证。

全书阐述了古今中外教育的基本事实及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试图让读者能够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特殊国家情况与社会背景之间的有机关联。作为讲义,作者努力把学术通俗化,用准确的语言、翔实的事例和合理的逻辑